

解读与阐释

——域外文学论稿

不时插入一些独立的小故事,使小说形式灵活自由,情节丰富多彩。另外,小说大量采用对照手法叙事状物写人,对比尖锐,戏拟生动。在人物设置上,主仆二人中,堂吉诃德是骑一匹瘦马的细高个子,桑丘则是骑一匹矮驴的粗壮汉;堂吉诃德说话彬彬有礼,满嘴文绉绉的骑士雅语,桑丘的语言却诙谐生动,出口就是一连串的谚语俗话;堂吉诃德缺乏现实感,沉浸于幻想之中,桑丘却头脑清醒,讲求实际;堂吉诃德勇敢鲁莽,奋不顾身,桑丘则谨小慎微、胆小怕事……。小说通过这一系列对比,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作品还把平凡的生活细节和富有传奇色彩的想象、滑稽夸张的闹剧场面和朴实无华的现实生活、悲剧性与喜剧性、英雄与丑角、智者与疯子结合,形成了特有的幽默讽刺风格。《堂吉诃德》体现了独特的语言风格,时而庄重,时而诙谐,时而含蓄,时而明快,一扫骑士小说惯用的华而不实的绮丽文体,体现了鲜明的民族风格。



英国

英国的人文主义文学是欧洲人文主义文学的高峰,它最早产生于14世纪,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期达到了全面繁荣。杰弗利·乔叟(1340?~1400)是英国近代文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主要作品是《坎特伯雷故事集》(1387~1400)。这部短篇小说集子以一批到坎特伯雷朝圣的客人的旅行为线索,写了24个短篇故事,绝大部分用诗体写成。故事集把宗教性的与世俗的故事集合起来,放在同一个时代背景里相互连接,栩栩如生地勾勒了一幅当时英国社会绚丽多彩的风俗民情画卷。这些富有浪漫意味的故事,表现了对教会僧侣们腐败虚伪的批判,对现世美好生活的肯定和追求,以及对人性的乐观主义信念等,为英国人文主义文学打下了基础。

托马斯·莫尔(1478~1535)的《乌托邦》(1516)是一部幻想

小说。作品通过一位远航归来的水手之口描绘了一个理想的社会。该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写水手与作者谈论国内现状,揭露了统治者的罪恶和人民的苦难;第二部分写水手讲到的一个名叫乌托邦的地方,那里的人民都具有高度的理性,没有贫穷,没有不公,是个理想完善的地方。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空想社会主义作品,对后来描写理想社会的文学有很大影响。

亨利·菲尔丁(1707~1754)是18世纪英国杰出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他在初涉文坛时写了许多剧作,后于1742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约瑟·安德鲁传》。安德鲁是个青年仆人,他拒绝了女主人的诱惑,决定离开都市到乡下去找自己的恋人芳妮,路遇牧师亚当斯,并在路上看到形形色色的物和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经历种种曲折之后,安德鲁和芳妮终于成婚。小说通过安德鲁的经历和见闻,描绘出一幅英国18世纪的社会风情画卷。小说中地主无法无天,法院贿赂盛行,贵族老爷嗜财如命,纨绔子弟丑态百出,上流社会的妇女放荡残忍,而在社会下层则充满同情友爱,两种生活情境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英国的现实生活给予了尖锐刺。

后续的《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1743)是一部政治讽刺小说。作品系根据当时轰动英国的一件案例写成。主人公魏尔德是公认的正人君子,后来案发被捕,却原来是个作恶多端的强盗头子。小说的批判矛头直接指向当时的首相瓦尔浦,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正义感以及对强盗政治的愤恨。在小说里菲尔丁说:“伟大在于使人类受尽各种荼毒”,魏尔德就是这种荼毒人类的伟人。另一部小说《阿美丽亚》(1751)描写温顺纯洁的阿美丽亚与穷军官布斯上尉结婚后,由于权贵们的威胁陷害以及布斯轻率的性格,生活十分痛苦。正在她走投无路之时,意外获得了一笔遗产,他们才苦尽甘来。小说通过主人公的遭遇,控诉了社会恶势力对穷人的迫害,揭露了法律制度的黑暗及司法机关的腐败,诚如菲尔丁在这部小

说的“献词”中所说的,该作品“是设计来发扬善德和揭露现今毒害社会的公私两方面最昭彰的罪恶”的。

《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1749)是菲尔丁的代表作,也是18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全书共18章,以故事发生的地点转换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萨默特郡奥尔华绥和魏斯顿两个乡村庄园为背景,细致描绘了英国乡村地区的生活;第二部分叙述男女主人公由乡间到伦敦途中的游历经过;第三部分反映了伦敦的都市生活,着重暴露上层社会的腐败堕落。

小说的主人公是个来历不明的私生子,被乡绅奥尔华绥收养长大,取名叫汤姆·琼斯。奥尔华绥的外甥布立非幼年丧父,也寄住在舅父家中并被立为继承人。两个孩子一同学习、一块儿长大,但两个人相处得并不融洽,汤姆性格忠厚诚实,布立非却自私虚伪,常在舅父面前讲汤姆的坏话。汤姆同邻居乡绅魏斯顿的女儿苏菲亚彼此相爱,更遭到布立非的忌妒恼恨,便挑唆舅父将汤姆赶出了家门。笃定于爱情,苏菲亚亦离家出走,前去寻找汤姆。两位青年主人公在途中虽然历经颠沛流离之苦,但也从经历的奇遇中增长了见识。在到伦敦去的路上,苏菲亚与一位乡村教师同行。汤姆从强盗手中救下一位夫人后,经不起诱惑而与这位荡妇幽会同居。得知此事后,苏菲亚愤然离去。汤姆闻讯,十分悔恨,立即动身追寻恋人。到伦敦后,苏菲亚住进亲戚贝那斯顿夫人家里。汤姆随后赶来打听苏菲亚的消息,却又被贝那斯顿夫人勾引与之发生了关系。这位夫人还施展诡计险些使苏菲亚失身。后来,汤姆再次遭到布立非的暗算被捕入狱。最后,布立非的阴谋被揭穿,汤姆的身世也真相大白,原来他也是奥尔华绥的外甥。于是,舅父取消布立非的继承权,改立汤姆为子嗣。汤姆和苏菲亚终于成为眷属。

小说描绘了从乡村到城市,从底层社会到贵族沙龙的全景图画,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示了18世纪中叶的英国社会生活。当时,

英国资本主义正在高速发展,封建贵族阶级正在加速没落,此种逆向交叉的社会现实,滋生出许多社会罪恶。菲尔丁为这一页历史留下了一幅生动的图形。在小说中,菲尔丁以锋利的笔触,揭露了贵族资产者腐朽的生活、上流社会人士的伪善自私嘴脸、婚姻方面的金钱门第观念;从资产阶级人性论出发,赞美了坦诚勇敢、慷慨助人的品质,并对下层人民的困难处境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小说塑造了两个对立的人物形象汤姆和布立非。汤姆心地善良、热情诚实,是个性格坦率的正直青年。在他离家之后,一路上见义勇为,做了许多助人为乐的好事。他也时常感情冲动,经不起女人的诱惑,但事后总能真诚认错。相反,布立非则心地歹毒,善玩诡计,最后闹得两手空空,连继承权也失去了。前者代表善,后者代表恶,善最终战胜了恶。苏菲亚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一位理想的女性形象,她敢于反抗、忠于爱情,是位纯洁、天真的少女。

《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结构完美,布局工巧,是一部故事情节复杂,人物角色众多的作品,但作者始终围绕着两个青年的矛盾冲突组织故事,既曲折多变,又有条不紊。其次,小说每章之前均有序言,用以发表作者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各章节中还插入许多论说与旁白,作者在叙事过程中不断进行道德和社会批判,促使读者进行理性思考,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另外,人物肖像鲜明生动,人物对话极富个性,讽刺调侃随处可见,既有力度又不失分寸,故而有人把这部小说称之为真正的“散文体滑稽史诗”。

威廉·麦克皮斯·萨克雷(1811~1863)最初写作讽刺幽默故事和诗歌。1847年因出版特写集《势利者脸谱》而获得初步成功。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是《名利场》(1848),这部讽刺小说奠定了他在英国文坛上的地位。

《名利场》从日常家庭生活和社会往来的角度,刻划了上层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众生相,揭开其体面豪华的外表,显示出内部的腐败溃疡。女主人公蓓基·夏泼的一生经历,是小说的基本情节

线索。蓓基以婚姻为阶梯,以色相和诡诈为手段,以上流社会的富有男子为猎获物,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不择手段的投机与角逐。蓓基聪明、无耻,是刻划得十分成功的女冒险家的典型。

除《名利场》外,萨克雷还发表了一些著名的长篇小说,如《潘登尼斯》(1848~1850)、《纽可姆一家》(1853~1855)、《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1852)等。

伊利莎白·盖斯凯尔夫人(1810~1865)的代表作《玛丽·巴顿》(1848)直接描写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斗争,刻划了有觉悟的工人形象,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反映劳资冲突的长篇小说。

在19世纪英国文学史上,勃朗特姐妹独树一帜的小说创作构成了奇特的文学现象。勃朗特姐妹出身于贫苦乡村牧师家庭。她们的父亲才智出众,培养了孩子们对文学的兴趣,发展了她们的想象力,锻炼了她们的文笔。三姐妹成年后开始创作,夏洛蒂和她的两个妹妹都有成功的作品问世。

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共创作了4部小说。1847年,她发表了以亲身经历为素材的作品《简·爱》(1847)。这部获得很大成功的小说是她的代表作。小说的同名女主人公是一个穷苦的孤女,从小被送进寄宿学校度过了少年时代。她的个性在歧视、压制和欺凌中得到磨炼,逐步成长为一个坚强自尊、热情敏感而有才干的姑娘。小说通过简·爱的遭遇向传统的等级观念提出挑战,揭露了社会的冷酷和资产阶级慈善事业的伪善。作品提出了妇女地位这一重大社会问题。艾米丽·勃朗特(1818~1848)的代表作《呼啸山庄》(1847)通过弃儿希斯克利夫复仇的故事,描写了一个惊心动魄的爱情悲剧,揭露了金钱社会的黑暗与罪恶。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狄更斯是普茨茅斯市一个小职员的孩子。童年时因父亲破产负债而辍学打工。屈辱艰苦的生活对他以后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1828年狄更斯进入新闻界,担任采访记者并开始写作。在40余年的创作生涯里,他共写了14部长篇小说和许多中短篇小说。他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30年代中期~40年代初)1836年狄更斯出版了其自称为“社会速写”的短篇小说集《波兹特写集》,写真性地描绘了伦敦社会普通人的生活,初步显示了作者观察日常生活、描写风物人情的能力。1837年狄更斯发表了成名作《匹克威克外传》。小说通过“天真幼稚”的善良绅士匹克威克和他的朋友们的游历,温和地讽刺了英国社会的议会政治和司法制度。这部自传性的社会风俗画卷形象生动,笔调幽默,风格明快,深受读者欢迎。1838年,狄更斯在《奥列佛·退斯特》中展示了外省贫民习艺所和伦敦贫民窑地狱般的生活。1839年《尼古拉斯·尼可尔贝》发表;次年写成的《老古玩店》揭露了高利贷者对市民阶层的残酷迫害,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儿童的悲惨生活,深刻暴露了新济贫法案的伪善本质。这些早期作品的共同特点是:

揭露社会罪恶,但未能深挖根源,将品格恶劣的坏人和不健全的社会机构视为造成社会灾难的原因;充满幻想和乐观情绪,温和的讽刺往往伴以轻松的幽默,受苦的“小人物”总有善良的资产者的庇护;结构上受流浪汉小说的影响显得较为松散。

中期(40年代)1842年他到美国旅行,回英国后发表了《美国札记》(1842)和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1843),揭示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拜金主义,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圣诞故事集》(1843~1847)中,在善战胜恶的“圣诞节精神”影响下,要求人们自我改造并互相帮助,呼吁调和阶级矛盾。这部作品在艺术形式上深受民间传统影响。《董贝父子》(1848)则进一步突出了金钱对人性戕害的主题。中期创作里,狄更斯对社会现实有了较深入的认识,作品中的乐观和幻想色彩有所减弱,着重强调资产者必须经历破产或其他磨难,才能改变为富不仁的本性;只有接受

感情教育,才能懂得“仁爱”和“谅解”。结构上,他已放弃流浪汉小说的形式,一般在一个或几个矛盾交织的情节中展开广泛的社会生活画面,描写众多的人物,使得作品结构严谨缜密。

创作繁荣期(50~60年代)在1848年欧洲革命运动的影响下,狄更斯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更为全面的审视,作品中的批判力量大大加强了。1850年发表的《大卫·科波菲尔》通过主人公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经历,赞扬了正直、勤劳的品格,抨击了贪婪伪善的恶习。该作品人物描写夸张而不失其真,叙述细腻而不显沉闷。《荒凉山庄》(1853)则以两条彼此联系的情节线索,通过貌似荒诞的诉讼案件,集中抨击了英国的司法制度。发表于1854年的《艰难时世》是一部直接描写劳资矛盾的作品,描写了令人窒息的生活环境和骇人听闻的贫富悬殊,突出强调了道德感化的力量。《远大前程》(1861)在难以逾越的巨大阶级鸿沟面前,描写了穷小子匹普一心向上爬而最终失败的经历,体现了作者社会认识的深化。1865年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朋友》通过互相交错的多条线索,以散发臭气的垃圾堆来象征腐朽的社会现实,指出一切犯罪的根源即现存的社会制度,标志着作者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最后论断。此期作品的主要内容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和贵族阶级的腐朽,批判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揭示日益激化的劳资矛盾,抨击统治者的残暴凶恶。作品风格则由幽默轻松变为沉郁坚实。这一时期最成功的作品是《双城记》。

狄更斯作品的思想艺术特色是:既富于揭露性、批判性,又常常塑造虚幻的“正面人物”,制造大团圆结局;既讽刺批判资本主义,又反对暴力革命,期望用情感教育和道德力量调和阶级矛盾;通过塑造歌颂善良人物表现生活理想;常以儿童的眼光来观察现实世界,赋平凡事物以奇异的色彩;在叙述故事时幽默与感伤的情调交替出现,情节富有戏剧性;人物描写上善于抓住人物特点,喜用夸张手法塑造形象。

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从 1853 年开始酝酿,于 1859 年完成,是反映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长篇小说。作者以伦敦和巴黎两地对比,力图用法国革命这面历史的镜子,来反照 1857 年经济危机后的英国社会,故定名《双城记》。该作品结构严谨精巧,悬念丛生,高潮迭起,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小说分 3 部:“复活”、“金钱”和“暴风雨的踪迹”。实际由“冤狱”、“爱情”、“复仇”3 组故事构成,共计 45 章,每章均有标题。第一个故事“冤狱”中,作者选择了典型的事实揭示革命前法国贵族残暴统治的罪恶,试图以此说明“复仇”故事的起因,突出暴力革命是暴力压迫的必然结果的观点;而“爱情”故事则以亲情之爱、情侣之爱、情敌之爱、对仇敌后代的爱等形式穿插在“冤狱”和“复仇”的黑暗恐怖之中,用人道、博爱的理想之光照亮历史进程。作品的“序幕”是第 1 部的第 1 章,叙述了 18 世纪 70 年代中叶英法两国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及动荡不宁的时代背景。“序幕”之后,便围绕着梅尼特医生的冤狱、厄弗里蒙地侯爵的暴行、得伐石太太狄尔斯的复仇、英国青年卡尔登的自我牺牲等情节线索展开,并逐一解开悬念,生动描绘了当时英法两国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激烈的阶级对抗,展示了法国人民起义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史诗式的场面。

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形象有梅尼特医生、代尔那和医生的女儿路茜。梅尼特医生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中心人物,是作者同情、爱怜、赞赏的人。他年轻时仁慈正直,在被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绑架去“诊病”时,目睹侯爵兄弟强暴民女、虐杀无辜的残暴行径后,不为金钱诱惑,听凭“良心”召唤,毅然写信告发了他们并因此被关进了巴士底狱。在监狱中,他用煤灰混合着血水写下一份控告仇敌的“文件”,发誓要向侯爵复仇。出狱后他的性格开始升华,有了用宽容消除痛苦、用博爱消除仇恨的信仰,甚至同意女儿路茜与仇人的儿子相爱。“复活”后的医生成了狄更斯人道主义理想的体现者,通过这样一个“善”和“爱”的化身宣扬了以爱化解恨,以善行和

美德改造社会,消除阶级对立的人道主义观念。

卡尔登替代朋友捐躯的壮举是作者人道主义理想的样板。卡尔登是有才华而敦厚纯朴的英国青年,他同利己主义社会格格不入,不为那个社会赏识,成为多余的人,生活中倍感孤独忧郁。这种感受表露了小资产阶级对不公平社会的愤慨。因此,他的自我牺牲带有明显的社会批评倾向,他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用博爱道德与暴力压迫相抗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典型。他和法国青年代尔那同时爱上医生之女路茜,了解到路茜只钟情代尔那,他对路茜发出了:“倘若我的生涯中有值得牺牲的可能和机会,我甘愿为您和你所爱的人而牺牲”的誓言,并将这个誓言诉诸于实践。作者将他的死置于法国雅各宾党人专政的历史背景上,用其自我牺牲与暴力革命的残酷无情相对照,通过血的洗礼而颂扬基督的博爱精神,以捐躯壮举的道德升华来对抗和超越暴力革命,既将这种捐躯实现于法国而预示未来的英国,又在暴力压迫引起的暴力革命面前对抗暴力革命,显现了作者思想的矛盾和历史局限。

第三类是以得伐石夫妇为代表的革命者形象。法国酒贩得伐石的太太狄尔斯,生于被奴役欺凌的农奴之家,成长在渔民中。她与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有杀父、杀兄、杀姊的不共戴天之仇。加入革命党后,她在斗争中锻炼成为坚定、勇敢而富有领导艺术的革命战士,比丈夫更加忠实于法兰西共和国。作者赞扬她是“伟大的女人!倔强的女人!堂堂的女人!了不得的女人!”。作者以她的形象肯定了法国大革命的必然性和正义性。当然,作者对于法国革命的态度是矛盾的,对得伐石太太的描写也是不平衡的。一方面,他认为法国革命是必然的,暴力革命是暴力压迫的结果,爆发革命的责任在封建统治者,因此对1792年以前的得伐石太太运用了肯定的笔触,颂扬她的坚强刚毅,欣赏她的智慧、胆略和求实精神;另一方面,狄更斯不同意、害怕甚至抗拒暴力革命,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理想出发,在小说中表现了暴力革命丧失人性的认识。所以

作者对雅各宾党人专政时期的得伐石太太采用了漫画式的手法，将其描绘成为一个冷酷、凶狠、嗜血成性的报复狂，在作品中极力渲染革命的残酷和疯狂，歪曲了革命者的形象。象征着“仇恨”和“复仇”的得伐石太太最终的“自取灭亡”，既是作者从宽恕仁爱的人道主义思想出发为“恨”安排的结局，也是作者以爱化解恨的博爱精神从别一角度的反映。

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和巴尔塞是作者着力鞭挞的恶势力代表。侯爵兄弟视农民为家奴，恣意凌辱和残杀，驱马车辗死穷苦儿童，私设刑堂绞杀无辜，侮辱强奸农家妇女，力图用武力维护贵族特权。巴尔塞则是有奶便是娘的蠢贼。作者笔下，他们的暴行最终受到革命者的清算，以此指出了封建贵族的必然灭亡。

通过对法国大革命前后几个家庭的恩怨纠葛故事的描写，《双城记》展现了阶级斗争的酷烈，影射了英国社会阶级尖锐对立的现实。小说以高度的艺术表现力反映了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以生动的笔调描绘了人民起义的史诗式场面，承认了人民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承认了人民反抗暴政的正义性，这在英国文学史上实属罕见。但其否定暴力革命，宣扬以仁爱宽恕调和阶级矛盾的主张却具有较明显的历史与阶级局限性。

小说集中表现了狄更斯的现实主义艺术技巧。《双城记》穿插运用正叙与倒叙，情节安排富于戏剧性，结构精巧严谨。狄更斯的早期作品受流浪汉小说影响，缺乏结构的完整性。《双城记》的创作已克服了这方面的弱点，把得伐石复仇的线索和梅尼特命运的线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巴黎和伦敦两都市的生活场景加以对照组合，事件发展有急有缓，悬念丛生，高潮迭起，整部作品达到了有机统一。小说还把历史动荡的宏观表现和具体人物的命运描写结合起来，在主人公性格的发展和他们的命运中暗寓着历史的教训；作品中法国革命的巨幅画面又为人物的塑造提供了生动的历史背景。另外，作者还在现实主义的图景中引入幻想成分，在情节

铺排和人物命运的叙述中体现一定的浪漫主义特征,以生动、丰富的想象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托马斯·哈代(1840~1928)是19世纪后半期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

哈代出生在英国多塞特那乡下,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农村生活,从幼年起就培养起了对文学的兴趣。22岁时,他只身来到伦敦,边工作边学习,接受了雪莱、华兹华斯、司各特等文学家以及达尔文和孔德学说的影响。

哈代是以写诗开始其文学活动的,后来转为创作小说,一生写有14部长篇小说和4部短篇小说集。他把自己的小说分为3类:“罗曼史和幻想”、“爱情阴谋故事”、“性格和环境小说”,其中以后者成就最高,哈代最优秀的作品大部分属于这类。由于这些小说多以英国南部威塞克斯地区为背景,因而又被称之为“威塞克斯小说”。70年代以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创作,此期作品具有美化宗法制农村生活,反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思想倾向,《绿荫下》(1872)和《远离尘嚣》(1874)可以视为标本。长篇小说《绿荫下》是哈代一系列“性格和环境小说”的第一部。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诗意的笔调描写了英国南部的自然风光和宗法制农村的田园生活。《远离尘嚣》显示出资本主义利己主义原则对偏僻农村的渗透,说明即使在那些远离尘嚣、与外界隔绝的地方,照样在演出着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悲剧。经过对社会进一步的观察研究,哈代对宗法制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开始从田园诗式的幻想中解脱出来,转而反映现实。《还乡》(1878)、《卡斯特桥市长》(1886)、《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1896)等作品均体现了这种思想转变。《还乡》揭示工业文明侵入古老农村后产生的种种矛盾,展现了现代文明与古风民俗碰撞冲突给人带来的精神力。对爱敦荒原的描写则显露了哈代的神秘主义和宿命论思想。《卡斯特桥市长》反映了在资本主义价值观、道德观日趋确立

的情况下,传统道德必然面临的强劲挑战和深刻危机。《无名的裘德》既批判卑陋习俗,又抨击道德的虚伪和法律的不公平,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意识形态对有为者才华的扼杀,流露出作者强烈的愤懑情绪。

哈代的小说代表作是《德伯家的苔丝》(1891),该作品通过贫苦农家姑娘苔丝的悲惨故事,批判资产阶级道德和宗教的伪善冷酷,展示了19世纪后期工业文明冲击下英国农村日益衰败的历史景象。苔丝美丽、纯洁、善良,然而贫困的家境迫使她从小就要负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她外出作工,被东家亚雷侮辱,成了不见容于社会道德的“堕落女人”,心灵受到严重创伤。从此她恶运缠身,生活倍加艰难。后来,苔丝在一个农场与安玳·克莱相爱。结婚之夜,苔丝以往事真诚相告,谁知克莱竟遗弃了她远走巴西。再次陷入困境的苔丝又落入了亚雷的控制。当克莱再度出现后,苔丝在极度的精神刺激下杀了亚雷,很快遭到缉捕并被判以死刑。

苔丝是哈代笔下女性形象中最为成功的一个。作品赋予了她许多优秀的品格:美丽善良、勤劳纯朴、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向往美好生活、敢于反抗斗争。苔丝的远祖虽然属于古老的德伯世家,但她从小生活在贫困环境中,根本不稀罕贵族血统。她到冒牌本家亚雷·德伯家干活,只想凭自己的劳动赚钱糊口,并不是为了联亲认宗,更没有嫁给阔人的侥幸心理。受到亚雷侮辱后,她没有依照当时的陈规陋习作亚雷的姘妇,而是坚决离开他,宁可落个“不正经女人”的名声。安玳·克莱唤起了她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和憧憬。她爱克莱并非觊觎他的财产和地位,而是爱他心地善良、思想开明。强烈的自尊心使苔丝死也不肯向克莱的父母请求经济帮助,为谋生她只好当临时雇工,受农业资本家的剥削压榨,干着力不胜任的繁重劳动。父亲世后一家人流离失所,亚雷又死命纠缠,迫使苔丝再度与亚雷生活在一起。克莱的重新出现,激起了苔丝对多年来身心遭受的折磨和摧残的反抗,她愤而杀了亚雷这个毁灭她

幸福的罪恶元凶。作为社会最下层的一员，苔丝一生都是社会的受害者，当她采取反抗行动时，却被资本主义法律视为罪犯，从而剥夺了她生的权力。哈代对其女主人公寄予深切的同情。他认为苔丝是无辜的受害者，在小说中竭力为这一犯了“奸淫罪”和“杀人罪”的女子辩护，还特意为小说加了个副标题“一个纯洁的女人”，由此可见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礼法是持批判态度的。

小说中两个男主角的塑造，加深了对迫害苔丝的社会力量的揭露。安玑·克莱是历史蜕变期一个具有自由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他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鄙视资本主义社会的习俗偏见，极力想在思想和行动上摆脱旧有规范，探索新的生活道路。他厌恶都市文明，拒绝担当牧师，决心务农为生。然而，因其思想深处与本阶级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故与旧传统的脱离只能是形式上的，对旧道德的反抗也是有限度的。他当农工目的是当大农场主，娶苔丝也是为了得到“纯洁”的姑娘。听到苔丝坦白往事，尽管他自身并不“纯洁”，却不肯给苔丝以宽宥同情。正是他的遗弃给了苔丝致命的精神打击，正是他所恪守的“道德”观念把苔丝逼上了悲剧性终局。在安玑·克莱这一形象身上，充分显露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进步性和软弱性，这种性格的二重组合使得这一形象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亚雷·德伯是个出身于新兴资产阶级暴发户家庭的流氓恶棍。他仗恃金钱为非作歹，为满足淫欲设圈套侮辱了苔丝。由于有社会道德和法律为其撑腰，作恶后他非但没受到惩罚，反倒摇身一变成了拯救他人灵魂的牧师。他的无耻行径充分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道德、法律和宗教的虚伪丑恶。

《德伯家的苔丝》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农村后，宗法制小农经济瓦解，个体农民因贫困破产而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惨状，以及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的种种摧残和凌辱，从而揭示了苔丝悲剧命运的社会原因，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道德、法

律、宗教进行了有效的批判和控诉,又由于看不到战胜社会邪恶势力的力量何在,因而宣扬了悲观主义宿命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思想性。

作品的结构严谨,全部情节紧紧围绕着女主人公的命运展开,极少繁冗累赘之处。哈代善于通过细节和人物心理揭示人物性格,主要人物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真实感人。哈代笔下的自然景物往往与人物的悲欢离合糅合在一起,起着渲染气氛,揭示人物命运的作用。语言质朴自然,富有一种天然的魅力。作者还经常在叙述过程中发表议论,表达观点,增强了作品的揭露批判力量。

戴维德·赫伯特·劳伦斯(1885~1930)是20世纪英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一生创作了10部长篇小说、40余篇短篇小说,近千首诗和4个剧本,以及一些文学评论,其中尤以小说最为著名。

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英国农村经济濒临解体,残余的宗法感情也逐渐消失,人越来越沦为机器的附庸。劳伦斯认为,文明的发展不应该以扭曲人的本能和自然欲望为代价,而人的本能和欲望之中最基本的一项是性爱要求。他还认为,只有使人的全部自然本性特别是性欲望充分发挥,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罪恶;只有使人的原始本能充分复活,才能使人与宇宙之间和人与人之间恢复和谐的关系。因此,追求新型的两性关系就成为劳伦斯小说创作的一项基本主题。

劳伦斯儿时的家庭生活和青年时期的恋爱经历与其创作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劳伦斯是矿工之子,母亲当过教师,由于夫妻感情不和,母亲将全部爱心转向了儿子。母子之间的这种亲情关系在带有自传性的《儿子与情人》(1913)中有详尽的记述。1906年进入诺丁汉大学师范系学习并开始小说创作。1912年母亲去世。同年到诺丁汉大学教授威克利家中拜访时,与教授的妻子一见钟情,遂相约出奔。在法国、意大利等地旅行期间完成了《儿子与情

人》。

《儿子与情人》的故事围绕煤矿工人莫瑞尔一家的生活,描述了主人公保罗的成长过程,其间交织着夫妻、父子、母子和情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反映了深刻的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保罗的母亲葛楚因与丈夫感情不和睦,遂把爱心转向儿子。但是,母亲的爱控制了儿子的情感,致使儿子丧失了与其他女子正常恋爱的能力,直到母亲去世后,这种情况才渐次消失。书中保罗在精神与感情上的分裂倾向,全面符合弗洛伊德心理学中“俄狄浦斯情结”的症状:母亲因失意于丈夫,企图从儿子身上得到补偿;儿子在母爱的控制下,被异化为“半男人”,丧失了恋爱能力。小说中母亲葛楚与儿子保罗之间的爱已超出了正常的界限。

这部小说的意义不仅在于对个人进行精神分析,更重要的是从精神困境中寻找社会和道德上的原因。保罗的病症与畸型的家庭关系以及西方现代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现代工业化进程中,矿工们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成天干着非人的苦力活,性格粗暴蛮横,酗酒和打骂妻子已成为这一社会阶层特定的生活方式;矿工的妻子则只能在贫困、肮脏的狭小房子里养儿育女。葛楚就生活在这样的处境中。她对丈夫不满,把爱转移给儿子,才造成了保罗的心理变态。因此,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和非人的劳动条件与生活状况破坏了家庭幸福,摧残了人们精神上的健康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伦斯深居简出,埋头创作,相继完成了代表作《虹》和《恋爱中的妇女》(1920)。战后又写了《袋鼠》(1923)、《羽蛇》(1926)等作品。

《恋爱中的妇女》是《虹》的姐妹篇。作品通过两对男女之间悲欢离合的故事,探索了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中建立人与人之间完美关系的可能性。女教师厄秀拉爱上了同校工作的伯钦。伯钦漠视人生,言谈中充满了愤世嫉俗的情绪。在两性关系上,伯钦反对

婚姻沦为一方占有另一方感情与肉体的形式,希望男女双方既结成共同关系又保持完全独立。厄秀拉虽然认为伯钦的想法是“一种固执之见”,但还是与其共建了生活。厄秀拉的妹妹古特伦是和她同校的工艺教师,对年轻英俊的煤矿主杰拉尔德一见倾心。杰拉尔德这个“工业巨子”是现代机械文明的化身,他把自己和工人都看成生产工具。当他的改革取得成功的时候,他却变成了情感枯竭之人,最后冻死在阿尔卑斯山的冰雪中。他的下场象征着“机械原则”的破产,说明没有爱的关系只能走向灭亡。

1928年完成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引起的争议颇多,但其表现的则是严肃的主题。查特莱爵士婚后不久就在战场上负伤,下身瘫痪,失去了生殖能力。为了产业后继有人,他让妻子康妮“与别的男人生个孩子”。康妮厌倦死气沉沉的生活,与雇工梅勒相恋出走。依托机动轮椅生存的查特莱爵士是现代工业社会中失去自然天性的剥削者,在他身上体现了工业文明的罪恶。他丧失性机能的躯体正是现代工业文明丧失活力的象征。与他相对立的梅勒身强力壮,洋溢着自然的勃勃生气,是理想中的“自然之子”。康妮离弃丈夫与他结合,表达了作者由文明人到自然人、实现人类新生的愿望。小说反映了现代工业社会对人的自然天性的摧残,再一次表达了作者希望通过实现身心一致的性关系求得新生的思想观念。

由于劳伦斯将社会批判和心理分析结合起来探索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故而其作品既有现实社会意义,又有心理学含义。他的创作倾向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但又注重心理分析,力求“淡化”情节,许多地方运用了具有现代主义特征的象征手法。

《虹》(1915)代表了劳伦斯创作的最高成就。从这部小说开始,劳伦斯的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虹》的故事围绕着布兰温一家三代人的生活经历展开。大约19世纪中后期,这个家庭的小儿子汤姆·布兰温继承父业,在英国德